绪　论

《秦代军事史》，上承战国，下启西汉，共 7 章、27 节，约 17 万字。其基本内容为秦代的战争、军制、国防以及武器装备、军事思想和军事人物。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在全面客观地综述秦代军事历史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阐明秦代军事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特点及其在中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研究、总结秦代军事史的经验和教训，吸取精华，弃除糟粕，“古为今用”。

研究秦代军事史，首先必须弄清秦代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而后才能对各种有关的军事问题做出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和评价。秦代，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 年）建立秦朝，至秦二世三年（前 207 年）秦朝灭亡，首尾总计不过 15 个年头，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这一瞬却非同凡响，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统一局面，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分水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民族之一，在夏、商、周三代的奴隶制时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已达到相当水平，出现了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 的局面。但是，国家集中、统一的程度还不高，有许多邦国存在。至春秋战国，随着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兼并、争霸之战不已。直到公元前 221 年，才在秦王政的领导下实现空前大统一，创建了中国历史上，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的、封建统一国家——秦朝。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新纪元，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其深远的历史影响，下及汉唐明清，长

① 《诗经·小雅·北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达二千余年。正如前人所云：“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①“秦也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②甚至不少学者认为，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某些称谓，诸如“支那”、“赛尼”、“希尼”等等，也都是由“秦”的音译演变而来。秦代在历史上所处的承前启后的地位和特点，不仅仅体现于政治领域，也同样体现于军事领域，表现于战争、军制、国防、军事学术等各个方面。

秦代的战争较先秦有很大的发展。它不同于夏、商、周时期部族、方国、诸侯间的征服战争，也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战争和战国时期的七雄割据、兼并战争，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战争的性质、规模、类型都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中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

秦代统一战争即秦灭六国的战争，始于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终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以秦的全面胜利，韩、赵、魏、燕、楚、齐六国的彻底灭亡，国家的空前大统一而告结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它不仅在规模、时间、空间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往历次战争，尤其重要的是在战争目的上发生了新的飞跃。以战国时期的历次战争为例，战略目标大者为兼并，小者为蚕食；而秦灭六国的战争则不同，其宏伟的战略目标是“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③，从而把封建割据、兼并战争发展为封建统一战争。没有统一战争的胜利，就不可能开辟大一统的新纪元。当时新生的封建制度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强烈要求政治上的统一，而七雄并立、诸侯割据的存在，正是历史前进的一大障碍。统一战争恰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对于促进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秦代军事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统一战争的最

① 谭嗣同：《仁学》卷上

② 恽敬：《大云山房文稿·三代因革论》。

③《史记·李斯列传》。

大特点就是有多政权、多势力并存，以一方消灭其他各方为根本目的，因而需要高超复杂的战争指导艺术。秦统治者在以一敌六的形势下，运用“连横”的谋略和远交近攻的思想，成功地对六国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策略，从而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这一经验后来广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借鉴，成为历代战争中极为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指导艺术。

秦代的民族战争主要的有两次，即秦始皇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前 215～前 214 年）北击匈奴的战争和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22～前 212 年）南平百越的战争。前者兴师 30 万，以匈奴远遁、收复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开地千里，继之以大修万里长城而结束；后者陆续增兵至 50 万，以平定百越、徙民岭南、设置闽中、南海、桂林、象郡而告终。这两次民族战争不仅其规模和成效都远非先秦所比，而且战争的目的也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如果说先秦华夏族同周边少数族的冲突基本上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原、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之后，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则是为了统一边疆、开拓边疆。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与融合是历史的必然，中原的统一以及中原和边疆的统一也是历史的必然。而“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①。当时匈奴正处于向奴隶制转化的阶段，蒸蒸日上，不断南下，对秦王朝的边防构成重大威胁。秦王朝是封建统一国家，急欲扩大自己的统治，“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②。因而秦匈之战成为不可避免，其阶级内容为新兴地主阶级对正在形成的新兴奴隶主阶级的战争，在客观上属于封建统一国家保卫边疆、开拓边疆、统一边疆的战争，对于保护中原经济文化和促进内地与边疆的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南平百越，则更是统一战争的继续。当时百越大

①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

②贾谊：《过秦论》。

部分尚处于原始部落阶段，没有统一的政权存在。他们自古以来与中原交往密切，并在战国时成为楚国的势力范围。因“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①，遂导致10年之久的秦越战争。通过这场战争统一了岭南广大地区，对祖国的统一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在北击匈奴和南平百越的战争中，秦统治者采取的战略方针各不相同。针对匈奴游牧经济生活，飘忽不定，军事行动多游击袭扰，地理环境寒苦，不利农耕等特点，采取以防御为主的方针，即在军事打击、解除其威胁之后，全力加强边防建设，以利保护中原的安全。针对百越地理环境适于农耕、许多部族处于半开化的特点，采取以开拓为主的方针，即在全面军事占领之后广设郡县，实施同内地一样的统治，并通过大量徙民进行开发。这两条方针在秦代都取得了成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经验。

秦代农民战争即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大起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斗争之激烈都是空前的，不到3个月革命烈火即燃遍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不到3年就彻底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当时我国正处于封建社会上升发展阶段，大起义之所以爆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秦朝的“暴政”，即无穷的徭役和残酷的刑罚，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简单再生产难以维持，广大劳动人民陷入苦难的深渊，从而激化了人民群众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封建统治集团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民战争的任务不是更新社会制度，而是排除历史前进的障碍。秦末农民大起义恰恰抓住了当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障碍，提出“伐无道，诛暴秦”② 的政治口号。这一口号成为农民大起义的政治纲领，不仅动员了广大农民群众，而且也动员了其他各阶级、各阶层、各地区的反秦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了秦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从而保障了军事上的最后胜利，结束了秦王朝的“暴政”，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这一历史经验，对后

①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

② 《史记·陈涉世家》。

世农民起义战争也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秦代的军制，是先秦军制，特别是战国军制的继续，尤其是商鞅变法后秦国军制的继续。但在全国统一后新的历史条件下，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秦代军制更加显示出其开创性的地位和意义。如果说商鞅变法后秦国军制的最大特点是“上首功”①；“利禄官爵抟出于兵”②；“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③，那么，统一后秦代军制的最大特点，则是确立高度集中统一的军队领导体制，从而维护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周代的所谓“天子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卿大夫“百乘”④制度，实质上就是各级奴隶主贵族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军权分立的状况，随着西周的灭亡、东周的衰落和诸侯的强大，从而加剧了春秋战国长达五百余年的争战。历史经验表明，政治和军事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政治上的统一就不可能有军事上的统一，而没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军队，就不可能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秦代正是在这方面首次提供了重要历史经验。

秦代鉴于历史上诸侯“相攻击如仇雠”、“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⑤的教训，在统一天下的当年秦始皇即定下果断的决策，宁愿以“子弟为匹夫”⑥而废除了历史上沿袭很久的分封制，从而强化中央集权，消除军队分立的政治基础和历史传统，防止“立国”、“树兵”⑦的隐患。与此同时，还确立了加强军队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和措施，把军权高度集中于封建国家的最高代表——皇帝的手中。武装力量的征发、调遣和动用之权直接属于皇帝，没有皇帝的玉玺、虎符和竹节，任何人都调动不了 50 人以上的部队。太尉虽为全国最高武官，但若不得皇帝的委任，则无权

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② 《商君书·赏刑》。
③ 《荀子·议兵》
④ 参见《汉书·食货志》。
⑤⑥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统率和指挥军队，实质上只是皇帝的参谋、顾问和助手之一。战争的决策权也属于皇帝，而负责战场指挥的将军则由皇帝任免，战事一结束即将还于朝，兵归郡县，将不得专其兵。同时在武装部队中设置相应的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控制和掌握部队的行动，以确保其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与各级政权组织相适应，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地方郡县、直至基层的乡、亭、里，层层都设有主管军事工作的机构、官员或分工负责的专人，从而加强对全国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与当时以封建小农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推行统一的郡县征兵制，先以适龄青年服“正卒”兵役，训练标准的“材官”（步兵）、“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楼船士”（水兵），两年后转为预备役，随时应召参战，从而做到寓兵于民，农战结合，预备役与现役结合，既有强大的常备军，又有雄厚的兵源。与全国统一后面临的形势、任务相适应，将全国武装力量区分为中央警卫和作战部队、边防守备部队、地方郡县部队，从而履行巩固国家政权、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统一的责任。

通过上述制度和措施，秦代在我国历史上建设成第一支空前强大而统一的封建国家军队，对于促进和发展祖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这是秦代给后世留下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后世封建统治者凡是忽视军队统一建设的，诸如西汉的七王之乱、西晋的八王混战、唐代的藩镇割据等等，无不给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历史的发展造成各种不同程度的危害。

秦代的国防，更具有承前启后的开创意义，其成就之伟大、业绩之辉煌、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无古人的。在秦代以前，虽然诸侯国防御工程的大量设施已在历史上出现，但由于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尚未形成，所以还谈不上有统一的国防。建设一个强大、统一而巩固的国防，在我国历史上正是从秦代开始的。其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

一是大规模的边防军事筑城。为了防御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骑兵的南下，秦王朝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战国时代秦、赵、燕等国所筑北部边防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新的、被

世界誉为人类古代文明奇迹之一的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同大量的关、塞、亭、障相结合，同大规模的边防驻军相结合，遂形成一个强大、巩固、统一的边防防御体系，对于保障秦王朝的安全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是大规模的军事交通建设。秦灭六国后，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控制和进一步统一边疆，在“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①即拆除各种诸侯割据设施的同时，立即在全国开始统一的战略交通的建设。先后修建了由首都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通往全国各战略要地及北部边防各军事重镇的驰道，由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通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的直道，由岭北通往岭南的新道，由今四川南部通往今云贵高原的五尺道，开凿了连接湘水与漓水的灵渠。通过这些大规模的工程，将秦代的都城和内地与边疆有效地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加强了国防，促进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

三是大规模的战略储备。秦代以厉行耕战政策而致天下统一，对粮食的战略储备极为重视。上自中央，下至郡县，层层都有负责粮食储备的机构和设施，形成了储备体系。在各级普遍储备的基础上，尤其重视各个战略地区的重点储备，如关中地区有著名的咸阳仓，中原地区有著名的敖仓，巴蜀地区有著名的成都仓，东部沿海地区有著名的琅邪仓，等等。这些重点储备，成为秦代国防建设中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对于秦代进行大规模统一和开拓边疆的战争和开展大规模国防工程建设，都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四是大规模地开发与建设边疆。秦代在北逐匈奴、南平百越之后，除采取重兵戍边和筑长城、修道路等措施外，还采取一项徙民实边的重大措施。在北方对于从匈奴占领下夺回来的河套地区和沿黄河新设的 44 县，都迁去了大批的民众。在南方则设置了更多的郡县，先后徙民数十万到岭南，与岭南人民杂居共处。这一措施既巩固了边防，充实了人力、物力，又促进了边疆地区的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碣石刻辞。

开发和建设，具有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

秦代的军事思想，也同样比先秦时期有所发展和前进。秦代存世时间虽然短暂，加之秦始皇焚书坑儒，因而未见有兵书传世，但军事思想归根结底是在战争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秦代的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都推动了军事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秦代统一战争和南平百越的战争实践中，即体现了多对象、多方向、多战场情况下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艺术。前者以关东六国为作战对象，在多方向、多战场实施作战，运用军事、政治、外交相结合的综合手段，通过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而取得全面胜利；后者以五路大军并进，席卷岭南，以空前规模的分路合围而取得平定百越的胜利。这种战略思想和作战指导艺术是先秦所没有的，先秦（尤其是战国）有过许多大规模的战争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冲突，但没有像秦代这样的多对象、多方向、多战场的战争实践和战略指导。又如，在秦末农民起义战争中，直取咸阳，分兵略地；当秦军集中兵力发起疯狂反扑和镇压时，许多义军采取流动、游击的作战形式，处处打击、疲惫、消耗、削弱敌人，使强大集中之敌顾此失彼，常常陷入被动和遭受挫败；而起义军则此伏彼起，到处点燃反秦斗争的烈火，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直至最后决战而夺得胜利。这种流动作战的形式，是先秦所没有的，实质上就是历史上的人民战争和游击战争，并成为后世人民群众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重要武装斗争形式。

秦代军事史不仅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正面经验，而且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事活动超越了国力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毫无疑问，秦代在统一、开拓边疆的战争中和国防建设中所取得的各项成就都是空前伟大的。但是，这些成就是在国力所不能承受的条件下，以人民所无法忍受的牺牲为代价而换得的，因此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秦代结束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战乱局面后，人民所渴望的是休养生息，社会所急需的是和平稳定的发展，而秦代统治者在东灭六国之后所给予人民的

喘息时间则过于短暂，前后不到 7 年。随即一方面大兴阿房宫、骊山墓等骄奢淫逸的土木工程；一方面又展开大规模的统一、开拓边疆的战争和大规模的国防建设工程，并以酷刑苛法为手段确保这一切的完成，从而把全国人民重新投入苦难的深渊。当时秦代总人口不过 2000 万，而北击匈奴用兵 30 万,南平百越用兵 50 万，修阿房宫、骊山墓用众 70 万，筑长城、修驰道所用民力也不下数十万，几乎把壮劳力和物力、财力都征调殆尽，终于导致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和秦朝的灭亡。秦亡于暴，其军事活动超越了国力所能承受的条件是构成秦代各种暴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也是导致秦代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人类的全部军事史表明，军事活动和国防建设在任何时代都必须以一定的国力（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和科技力等等）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事与愿违。这是一条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秦代以穷兵黩武、急功近利的反面教训揭示了这一规律，这和它的许多正面经验一样，都是军事史上宝贵的前车之鉴。

如上所述，研究秦代军事史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但是，由于秦代的历史极短，所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极少，给研究秦代军事史带来不少特殊困难，致使对许多重大问题都难以做出翔实的考辨和准确的判断。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故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意到以下四点：

一是秦朝与秦国结合研究。秦朝历史很短，秦国的历史却很长，秦朝是由秦国发展、变化而来，特别是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全面奠定了秦朝统一的基础，秦代军事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秦代的军制、武器装备等等，只有结合研究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制度、政策和特点，才能有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认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秦代军队的军功爵制，离开《商君书·境内》篇的有关材料就无法搞清；只有把这些材料同其他有关材料结合起来，才能对军功爵制的性质、内容、作用、意义、发展、变化做出适当的阐述。因此，研究秦代军事史必须同研究秦国历史的某些情况相结合，要做适当而必要的追溯，这是二千多年来研究秦

代历史的一个重要方法，当然也是研究秦代军事史的一个重要方法。

二是秦代与汉代联系探讨。汉承秦制，从各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秦代基本制度。许多问题由于秦代时间过短，史料阙如，难以定论，但却可以从汉代史料中窥见秦代的一斑甚至全豹。汉代不仅直接继承了秦代的基本制度，而且汉初对秦代的历史作过专门的分析总结，诸如贾谊的《新书》、陆贾的《新语》以及《淮南子》等，都论述和记载了不少有关秦代军事史的问题；至于《汉书》则所记更多，有些秦代史料难以解决的问题，从汉代史料中则可做出相应的分析探讨。例如，在秦代中央政府中到底有没有太尉一官，今人颇有一些怀疑①，因为在秦代史料中无法找到确定无疑的直接证据。但通过对汉代史料的分析，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汉初刘邦首以卢绾为太尉，继之者有周勃、灌婴、周亚夫、田蚡等人，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却明确地说："太尉，秦官。"《汉官仪》也记载说："太尉,秦官也,武帝更名大司马。"②可见太尉一官并非刘邦所首创，乃是汉承秦制而来。所以，研究秦代军事史时有许多问题必须同汉代有关情况联系起来探讨，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历来治秦史的传统方法之一。

三是历史文献与出土文物相互印证。近二十几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秦代与秦国的地下文物和地下竹简有不少新发现，如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以及云梦秦简等等，都给研究秦史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军事内容，填补了二千多年来不少空白。研究秦代军事史应特别注意这些新发现的史料，将新旧史料做综合比较的分析。例如，关于秦代兵役的起役年龄问题，新旧史料即颇有不同之处。《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曾载，秦昭王"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参战，说明起役年龄为 15 岁。云梦秦简所载《编年纪》中的主人公喜,却在 17 岁

① 参见《秦汉官制史稿》第一章第四节。

② 《汉官六种》第 122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 9 月版

时傅籍，说明起役年龄应为 17 岁。很显然，二者的区别不是时代下同所致，而是因情况不同而异，前者系特殊性的征调，后者乃一般性的法定起役年龄。值得注意的是，特殊性征调不仅存在于统一前的秦国，更存在于统一后的秦朝。由此可知，既有法定的起役年龄，又有不受法定年龄限制的特殊征调，一切依战争的需要为转移，这就是秦代兵役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兵役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只有对新旧史料做相互印证的比较分析，才能更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质。

四是思想材料与实践材料综合分析。撰写秦代军事史的最大难点，莫过于军事思想问题。秦代有赫赫武功，国防建设成就斐然，但在军事思想理论上迄今未见有兵书传世，有关人物的军事言论也如吉光片羽，寥若晨星。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反映出秦代军事思想的时代特色和本质，就必须把有限的思想材料和丰富的实践内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诸如东灭六国反映了什么样的战争指导艺术，北筑长城反映了什么样的国防思想，南平百越反映了什么样的战略方针等等，都寓有深刻的理论思想在其中。因此，以主要军事人物、主要军事言论和主要军事实践活动为依据，才能总结出秦代军事理论所特有的主导思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秦的由来和发展

自春秋至战国，我国社会经历五百多年的发展变革和激烈的诸侯争霸、割据、兼并战争，奴隶制度全面崩溃，新生的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历史大统一的条件渐趋成熟。公元前 221 年，在秦王政的领导下，取得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建立起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大一统的新纪元。

秦代的统一和后世历代王朝不同，既不是经过农民起义战争后的改朝换代，也不是少数民族自边陲进入中原而混一华夏，它是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经过自身的长期发展奋斗，逐渐地由小而大，由弱而强，由落后而至先进，由称王一方而至完成统一大业。因此，在阐述秦代军事史时，有必要对统一前的秦人和秦国的历史，尤其是军事上的发展情况，做些简单介绍和交代，以利窥其全貌，知其始终。

第一节　早期的秦人

秦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华夏族的组成部分之一，并参与了我国历史的早期活动。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秦人的祖先是“帝颛顼之苗裔”，其著名的首领伯益（即大费，亦称伯翳、柏翳），曾经和大禹共同平治水土，受到帝舜的赞扬。又曾为帝舜主管畜牧业，六畜兴旺，“鸟兽多驯服”，因而被帝舜“赐姓嬴氏”。这就是秦人祖先嬴姓的由来，也是古代东方其他一些部落嬴姓的由来。根据《孟子·滕文公上》的记载，伯益对开创古代农业生产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说，禹即位后曾经“举益，任之政”，临死前又曾经“以天下

授益”。但因“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遂由夏启建立了夏朝，伯益没有得到天下。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传说，都和古代畜牧业有关，诸如“伯益知禽兽之子孙不绝”①，伯益“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②，“伯翳综声于鸟语”③等等。这些传说虽然未可尽信，但它表明，秦人祖先是我国古代开化很早的一个氏族部落。他们深受中原文化的哺育，过着以原始狩猎为主的生活，很善长于畜牧业经营，同时又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知识，同农业经济有一定的联系。正是这些情况和条件，给秦人祖先后来的长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随着夏朝的建立，伯益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④，继续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自夏末商初开始，秦人祖先又活跃起来，其首领费昌“去夏归商，为汤御”⑤，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商汤灭夏桀的鸣条之战。此后，他们始终效忠于殷廷，“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⑥。其中有一部分秦人的祖先“在西戎，保西垂”⑦，即在今陕西渭河流域的中游一带同戎人杂处，守卫着殷王朝的西部边陲⑧。这部分人中最著名的首领是蜚廉及其子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⑨。后来周武王伐纣，殷朝灭亡，恶来被杀，蜚廉为殷朝的灭亡而殉死。

西周建立后，原来的殷人及其所属的氏族，包括秦人祖先在内，都变成了周王朝的氏族奴隶。居于渭水中游的嬴姓氏族和居于东方的一些嬴姓氏族被迁往周朝的西部边陲，先后在今甘肃天水一带定居下来，这便是春秋战国时秦人的直接祖先。他们在周

①②《汉书·地理志下》

③《后汉书·蔡邕传》。

④⑤⑥⑦⑨《史记·秦本纪》。

⑧根据郭沫若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秦公簋铭文考释》，西垂“泛指西方边陲”；根据李学勤著《殷代地理简论》，商王朝外服范围“其西界达渭水之中游”。故这里将西垂定为今陕西渭河中游一带。

王朝的统治下，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因他们保有中原文化的传统并富有游牧生活养成的善于驯马驾车和勇敢战斗的特长，后来渐渐被周王朝所重视。蜚廉的四世孙造父，以善御得幸于周穆王，曾为穆王驾车西巡。东归时日驰千里，平灭了徐偃王的叛乱。因而立功，得赐赵城（今山西洪洞北赵城镇西南），由此改姓赵氏，成为战国时赵国统治者的祖先。恶来的五世孙非子，由于“好马及畜，善养息之”①，得到周孝王的赏识，专门为周王朝养马，结果“马大蕃息”②，被周孝王封为附庸，令其“邑之秦（即秦城、秦亭，在今甘肃清水县东北），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③。从此，历史上才正式有了“秦”的名称。所谓“秦”，《说文解字》说：“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从禾春省。一曰秦禾名”。由此可知，“秦”字和农业生产是密切相关的，“邑之秦”，即在秦这一带地方立邑定居，做周朝的附庸，以抗西戎。

自非子受封之后，秦人在同西戎长期的斗争中发展。当时戎人的势力非常强大，于公元前 771 年攻入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沣水东岸），周幽王被杀，西周沦亡，这时，秦襄公率兵救周，力战有功，同其他诸侯一起将戎赶出了镐京。次年，周平王为了逃避戎人的进攻，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秦襄公又率兵护送。于是，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被戎人占领着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之地，令其赶走戎人后在这里建国。至此，秦襄公于公元前 770 年正式建立起奴隶制的诸侯国，完成了秦人由氏族制度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以上就是早期秦人的基本情况。他们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国家和军队，但却早已形成颇为可观的氏族武装，并同其他氏族发生了大量的武装冲突。秦人的氏族武装，不像夏、商、周中原王朝正规军队那样先进，是全体氏族成员兵民合一构成的，不是独立的军事组织。但它却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一是尚武精神很强，在长期以狩猎为主的生活中形成了勇战善斗的

①②③ 《史记·秦本纪》。

传统，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惜前仆后继，英勇牺牲；二是凝聚力很强，因同一定的农业经济相联系，过着相对定居的生活，不像戎人部落那样高度分散和流动，而有较好的集中性和统一性，能够在作战中发挥其团结对敌的力量；三是对中原王朝的向心力很强，因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虽久处边陲与戎人杂居而没有被同化，对待中原王朝同戎人的关系上总是倾向于前者，为保卫殷、周两朝的西部边陲，从而为保卫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的文明和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支早期秦人的氏族武装，就是后来秦国军队的前身，为秦军的发展奠定了许多基本的特征和传统。

第二节　春秋时的秦国

公元前 770 年至公元前 476 年，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时，周天子的权威江河日下，不能号令诸侯；齐、晋、楚、吴、越等国相继争霸中原，战争连绵不断；中原地区的奴隶制已濒临崩溃，各种社会改革方兴未艾，逐步开始向封建制过渡。就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下，秦国获得两次突飞猛进的发展，并经历一个由弱而强、由盛而衰的过程。

一是在秦文公（前 765～前 716 年在位）时代，大举东进，取得对戎人作战的重大胜利，“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①。这一胜利对于秦国的历史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岐，是周人的故居，即古代的周原，是关中最富庶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秦人占领这一地区后，既获得了极优越的自然条件，又获得了具有丰富文化知识和农业生产知识的“周余民”。从此，秦国的经济生活便很快地由以畜牧业为主过渡到以农业为主。与此同时，秦文公还逐步建立起奴隶制国家的基本法律和制度，如文公十三年（前 753 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②，文公二十年（前 746 年）“法初有三族之罪”③等等。这样，

①②③《史记·秦本纪》

随着对戎人作战的胜利，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初步奠定了国基。

二是在秦穆公（前 659～前 621 年在位)时代,把奴隶制的秦国推进到全盛时期。穆公勤于求贤，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谋臣，先后制定“东进、西进、南进三大政策”①。在东进中，曾于公元前 645 年的韩原（今山西河津、万荣间）之战俘虏晋惠公，迫使晋国献出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之地；但在公元前 627 年的崤（今河南洛宁西北）之战败于晋军，东进受阻。西进曾取得巨大胜利，“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②。南进曾攻占郡国（在今河南淅川南），至穆公去世停止下来。穆公时代极大地扩展了疆土，一跃成为与晋、齐、楚相匹敌的大国，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公元前 636 年秦穆公送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返国继承君位时，派出的护卫部队有“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③，说明秦军既有强大的车兵，又有强大的步兵，并有少量的骑兵，而当时中原各国，尚无骑兵出现。公元前 647 年晋国发生饥荒，“请粟”于秦，秦国的运粮车、船相继千里不绝，被称为“泛舟之役”④，可见秦国的农业经济已相当发达。

穆公时代的秦国虽然繁荣强盛，但整个奴隶制度在中原地区已濒临崩溃，在秦国亦由盛而衰。穆公一世英明，临死时竟以 177 人殉葬，其中包括一些高级贵族子弟在内，引起国人对奴隶制的强烈不满，以致人们由此认为“秦不能复东征也”⑤。此后秦国长期停滞不前，同晋的战争常常失败，但竭力维持着自己的大国地位。直至春秋末吴军破楚入郢（今湖北江陵），秦出兵车 500 乘挽

① 马非百：《秦集史·国君纪事七》。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韩非子·十过》。
④ 《左传》僖公十三年。
⑤ 《左传》文公六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